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张华腾◎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张华腾◎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 / 张华腾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1

(百年寻梦丛书 / 陈铁健主编)

ISBN 978-7-5317-2598-5

I . ①反… II . ①张… III . ①辛亥革命 - 史料
IV . ① 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547 号

反复

艰难的共和之路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封面设计 /  · 小威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240 千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598-5

目录 Contents

引言：共和道路之曲折	1
一、矢志共和：孙中山革命党人救国道路的选择	
（一）洋务自强梦的破灭	3
（二）维新变法的尝试	5
（三）孙中山革命救国道路的开辟	8
二、共和缔造：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
（一）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	18
（二）武昌起义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27
（三）南北议和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统一	40
三、实践共和：共和政治面面观	
（一）《临时约法》的颁布	54
（二）民初政党的勃兴	60
（三）国会政治和国会选举	72
四、共和劫难：洪宪帝制粉墨登场	
（一）内阁危机	84
（二）国会厄运	95

（三）约法废除	106
（四）帝制再现	116
五、共和再造：资产阶级各派系的空前团结	
（一）二次革命功亏一篑	129
（二）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的艰苦努力	136
（三）进步党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	144
（四）反袁革命的大联合——护国倒袁	160
（五）袁世凯帝制梦的破灭	164
六、共和复劫：张勋复辟丑剧	
（一）北京新政府成立	172
（二）约法恢复与国会复会	175
（三）府院纷争	182
（四）张勋复辟	190
七、共和重光：共和名义下的南北纷争	
（一）各界声讨复辟	203
（二）段祺瑞马厂誓师	205
（三）孙中山南下护法	208
结语：共和魅力	
（一）共和道路何其艰？	226
（二）共和魅力之所在	229
后记	232

引言：共和道路之曲折

1917年7月1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一大早就起了床的北京人，当他们走出自己的家门之时，无人不感到诧异：几年不见的前清黄龙旗插遍了大街小巷，龙旗在晨风中飘扬，哗啦啦地作响，北京在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怎么不见了踪影？

正当人们疑惑不解时，一道一道的谕旨高叫着从紫禁城里传出：

“张勋、王士珍、张镇芳、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著授为议政大臣，钦此。”

“张勋著补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钦此。”

“徐世昌、康有为关心国事，申明大义，著授为弼德院正副院长，钦此。”

……

原来，已经退位六年的清废帝溥仪，在张勋等人的怂恿下，宣告复辟了：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宣统复辟消息传来，京中旗人欣喜若狂，妇孺互相道贺。一般旧官僚也弹冠相庆，于是六年不见的顶戴花翎，又大出风头，以致京城内城各古董铺所存之旧物，一日售罄，连日加工赶制，以应购者之需。早已剪掉的辫子一下子生不出来，一些人跑到戏班子里寻找；一些人智商更高，索性将一股麻绳或细线，放到墨汁里一着色，就急急忙忙垂到自己的脑后；甚至还有些人将马尾巴剪掉，顷刻间就做成一条辫子……北京城里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政治情景，许多人在彷徨、在忧虑：中国共和道路怎么如此曲折？先是袁世凯洪宪王朝取代民国，其影子还未散去，大清王朝又接着复辟。民国成立这才几年，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中华民国的命运就如此多舛吗？共和道路还能否走下去？中国人民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一系列政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辛亥革命中国人选择了共和道路，促使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尽管道路曲曲折折，但帝制复辟是短暂的，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仅仅维持了83天，溥仪复辟更如昙花一现，12天就宣告失败。共和道路则持续向前。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实，充分论证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历史的发展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康庄大道，平坦笔直，而是弯弯曲曲，荆棘丛生。

一、矢志共和：孙中山革命党人救国道路的选择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选择共和道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入，由经济科技领域，逐步到政治领域，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这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和近代中国国情的，也并非是一个阶段的活动失败了，再去搞另一个阶段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同时同步进行的，如改革和革命。有些活动是一直进行的，如经济领域。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特作以下的安排。

（一）洋务自强梦的破灭

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阶级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战争好像仅仅是一阵风，大风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清廷一切又复故常，继续做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迷梦，“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严有诗书偶语之禁”^①，我们不得不佩服清廷的大愚若智，伤疤未愈，就忘了疼。其实，这只能是幻想，掩耳盗铃，西方列强哪能轻易就肯满足呢？

20年后，英法等列强发动了第二次侵华的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被打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清王朝的沉重打击，使清王朝陷入到深刻的统治危机之中，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魏源、徐继畲等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影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清王朝的一部分统治者中，尤其是那些对西方世界少许了解，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汉族地主官僚新贵中，深刻认识到王朝面临的深刻危机，李鸿章曾指出：“合地球

^① 《软尘私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

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他们认识到，对既有的现状，如果不改革、不变化就没有生路，因此纷纷提出“自强”口号，洋务运动由此发端。

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中，尽管洋务运动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以及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这主要体现在：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汉阳枪炮厂等。据统计，1865—1894年洋务派创建的军事工业总数达34家，涉及造船、制造枪炮、子弹、火药等领域。当代著名学者张海鹏先生对这些军事工业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说：“洋务军用工业的这些经济性质，无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生产关系方面，都表明它们已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属性，因而洋务军用工业的产生具有中国现代工业诞生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开端。”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发现经费不足，原材料短缺，运输、通信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军用工业的发展，针对这种状况，他们转化思路，以“求富”为目的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涉及航运、煤矿、通信、纺织、交通、钢铁等领域。这些民用企业的创办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垄断，为国家争得很多经济利益，并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为了抵御外侮，洋务派还积极筹建近代海军，前期大致用十年的时间，筹建了北洋、南洋、福建等三支海军，但是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几乎覆灭，促使清廷不得不更加重视以海军为核心的海防建设。于是设立海军衙门，着力建设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很快成为清廷的掌上明珠和洋务运动的标本，在世界海军发展史上也拥有一定的地位。^①尽管其中问题重重，但毕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阶段。此外，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还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着力培养洋务人才。设立京师同文馆和广方言馆，以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设立一些专门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以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派遣留学生是洋务

^① 北洋舰队是东亚各国实力最强的舰队。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海军居世界海军的前列，有第四位、第六位之说。即再保守一点，居第八位也在前列。

派又一重大举措，洋务运动期间共向欧美国家派遣了二百多名留学生，这不仅完全冲破夷夏之变观念的束缚，也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新体制，给当时及其以后带来的影响非同凡响。不仅弥补了洋务人才不足，而且也为逐渐摆脱西方列强对技术垄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以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实力派掀起的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一场现代化运动，其开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首先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洋务运动本质上又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只是单纯的依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的封建体制下，开办新式企业，由于体制腐败，效率低下，问题多多。所以，洋务派苦苦经营的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富强的根本转机，却在甲午一役中，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为标志，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梦的破灭。

因此，洋务运动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非议和批判。维新思想家严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曾给予非常形象的批判，直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简直就是“牛体马用”，结果必然导致非牛非马的尴尬局面。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人种之面然，不可强谓是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反思和批判洋务运动的过程中，维新变法运动应运而生。

（二）维新变法的尝试

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获取的巨大利益，使西方列强无不眼红，于是战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加强渗透，它们划分势力范围，强租租界地，妄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亡国灭种生死关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国内掀起一场爱国救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在甲午战前，中国就已经出现具有维新思想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汤震、何启、胡礼垣、陈虬、陈炽、宋育仁、郑观应等，他们著书立说。为康梁维新变法做了一定的社会动

员。他们主张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通过兴商务、习商战以保卫国家，政治上认为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最适合中国国情。但关于变法问题，王韬认为：“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冯桂芬认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我师之。”薛福成亦认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由此可见，早期维新派已有了初步的民权思想，并主张变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且崇尚西学。但是早期维新派自身还存有许多缺陷与不足，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又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思想也显得支离破碎，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其却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供了思想素材，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先导。

尽管说早期维新派已有初步的、朦胧的变法思想，但并没有付诸行动，还只是停留在文字叙述上。而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康、梁则挺身而出，把变法变成了现实。他们领导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积极宣传变法思想，一时间，变法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几乎出现“人人咸与维新”的局面。

维新变法要变什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变法成败的问题。在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变法当然要变封建之法为资本主义之法，维资本主义之新，在政治体制方面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但在变法的实际推行中，由于顽固派的极力阻扰，虽然远没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但无疑也是一场巨大的变革运动。

在实行变法的103天期间，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重叠机构和冗官冗员。经济方面，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并兼采中西各法；提倡开办实业，发展农政工艺，奖励发明创造，准其专利售卖；允许旗人自谋生计，经营商业；整顿厘金等。文化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允许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等。军事方面，裁汰绿营，力行保甲，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并统一制度；添设海军，筹造兵轮；各地兴办团练等。

关于维新变法的内容及其成绩，马勇先生曾有过较为全面的评论，他说：“1898年的变革是全面的，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领

域的改革争论大，成效小；军事领域的改革起步早，成效显著；经济领域也制定、颁布了许多新政策，只是由于时间短，并没有看出多少实质性的成效，但其重构近代经济体制的企图对后来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而文化领域的变革，主要是指变科举废八股，其所遇到的阻力最大，争论最激烈。”^①这种评价十分中肯。

康、梁维新派的这些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建议，无疑给人们勾画出一幅美妙的近代化蓝图。展现出一个未来的新中国。它对把维新运动引上正确轨道，把变法向深层次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03天内，人们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据学者最新统计，光绪帝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短短的3个多月，颁发有关新政谕旨280多件，其中明确指示具体办法、谕令实行和批准臣属所请实行的175件。从中可见，康有为要求变法的愿望可谓强烈，要求变法的内容也很广泛。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这样如此广泛的变革，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其严重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因而他们对变法阳奉阴违，并急忙游说慈禧太后，指出变法之危害，要求取缔变法。加之康有为介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权力之争，触及了西太后的用人权，又想聘请日本辞职首相伊藤博文为中国维新的总顾问，这些对变法都是极为不利的。结果在强大守旧派的反对下，维新派就大祸临头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先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后以“训政”名义，重掌国政，史称“戊戌政变”。政变后，慈禧大肆搜捕维新人士，除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外，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六人相继被捕，并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其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遭囚禁，或被放逐，或被革职，轰动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失败。追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守旧力量十分强大，维新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根本无力扭转当时的形势，当慈禧等守旧派发动反扑时，维新派无任何招架之力，只得任由摆布。（二）维新派树义过高，步子迈得太快，操之过急，对主客观形势估计错误，又缺乏群众基础。自6月11日明定国是至7月底8月上、中旬的兴学校、变科举、发展工商业以及用新法练军等方面的改革中，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步骤，改革之风来势迅猛，由于没有充分的宣传、组织，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观望、怀

^① 马勇：《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7页。

疑、抵触，因此改革一开始就遭到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官员的反对。（三）在变法中不讲求策略，康有为等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把清廷的最高实权人物——慈禧太后弄到了敌对的方面，并挑起了帝后党争，后来甚至还想出了围园劫后的幼稚做法，严重地低估了慈禧一派的实力。

戊戌维新尽管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守旧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有人认为这是“近代中国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然而，维新派的思想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遭到后起革命派的强烈攻击，革命派认为：“满洲政府实为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距此不远，革命救国的呼声就越来越响亮了。

（三）孙中山革命救国道路的开辟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但其最初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当时并不主张推翻清廷，而是希望清廷能在改革中自强，希望中国摆脱殖民枷锁，取得民族独立，使人民安居乐业。应该说他思想、行动的轨迹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潮流是改革。当然，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演变紧密相关。改良与革命间有一段历程，这段历程，可以说既是孙中山思想上超越的过程，又是其确立革命道路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与时俱进爱国思想的重要体现。

1. 改良思想之碰壁

中法战争的失败，在孙中山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对于自己目前的地位，已感到十分不满。时他在香港雅丽医学院学医。主办医院的人叫何启，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对满清统治非常不满，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猛烈抨击满清政治。孙中山读了这个小册子，非常赞同何启的主张，有一个时期，和何启往返非常密切。^①此外，孙中山还深受其乡贤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① 周哲：《孙中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38年版，第7页。

1892年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正式挂牌做医生，在澳门行医，那年他27岁。心系国家安危的孙中山认为，做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医生是不够的，应该做医疗整个中国的医生。因此在第二年，他离开澳门，到各处去考察，他希望通过正常的改革途径寻求救国富民之法。美国学者史扶林指出，“孙中山所具备的条件使他将更多地求助于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而并非更多地求助于三合会（指当时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当时的领袖是郑士良——编者注）他在香港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这两种可能的选择。这使他对中国问题有了一个全面的看法，同时也给了他这样的希望：即他可以致力于改革而不必一定要做一个造反者。”的确如此，这种思想确实支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理想和现实总会有差距的，孙中山一心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却在实际行动中碰了壁。事情是这样的，甲午战争前夕（1894年6月），他感到民族危机严重，准备上书当政者，将他的改良思想付诸现实，于是做了精心准备。为使他的建议被接受，他闭门静心思考，写了一封长信，又请王韬为之润色，还请郑观应为之介绍，他上书炙手可热的权臣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朝廷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对他的行动和建议竟然“借辞军务繁忙，拒绝延见”^①。然而就实情而言，李鸿章这时确实公务繁忙，我们不是为他开脱，因为此时甲午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有很多紧要的事需要处理和准备，军事的、外交的等，其他的事情恐怕是顾不上的，何况求见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孙中山一番好意上书李鸿章，可李鸿章一点不重视这个毛头小伙子，这使孙中山感到很失望。

孙中山要求改良行动的失败，使他渐渐认识到，靠着上书请愿的方式，希图把腐败的晚清政治扭转，是很不容易办到的。改良行动的失败，促使他对如何改造国家的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开始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在1897年再回首往事时，仍不无感慨地说：“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

^① 冯自由：《中国组织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页。

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由于孙中山感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根本行不通，思想上逐渐萌发了革命的救国意识，认识到：“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

2. 革命思想之萌发——创建兴中会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一向为中国人所轻视的东洋日本，清政府腐朽反动的本质进一步暴露，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深刻地显现出来。孙中山意识到，要靠腐烂得无法挽救的晚清政府，把中国从垂危中救出来是根本没有希望了，他的思想渐渐转到革命的方向来。早在中日开战之后，在清军连连败北的战况中，孙中山就到了檀香山，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希望在海外华侨中，能够找到一个基地，帮助他实现他的理想。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即是“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发布了《兴中会章程》，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章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反映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虞于目前。”有鉴于此“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华外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而入会者必须填写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并举行秘密宣誓仪式。誓书为：“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监察。”这里的合众政府，应该是特指美国的民主共和政府。

兴中会章程尤其是兴中会会员的秘密誓词，揭示了兴中会革命目标——振兴中华，推翻满清，创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共和民主政治。其革命目标之明确，旗帜之鲜明，是这一时期包括十年后国内兴起创办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所无法比拟的。中国要走美国的共和民主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迈步的。孙中山革命道路的开辟为什么选择了国外，为什么要以华侨为骨干力量？这是值得思考的，他之所以选择檀香山作为革命基地，不外乎这么几个因素：（一）海外活动能减轻清政府所造成的压力。（二）主要因为是国内封建势力强大，开辟革命道路之困难。（三）檀香山的地域，风土人情，为孙中山熟悉，有利于开展工作。同时这也是孙中山个人智慧的运用和体现。

孙中山开辟革命道路，的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兴中会创建

之困难。有著述说：“先生至檀岛创兴中会，纠合华侨共图革命，顾此时人心锢塞，无异内地。故虽鼓吹数月之久，无如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此行也，仅得邓荫南及其胞兄德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艰辛困苦有如此者。”^①其次，观念上的困难。人们视革命如猛虎，清廷镇压农民革命的残酷性深深印在普通百姓心里。就当时而言，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是维新变法运动。人们一听见革命，都避而远之。有的甚至嘲讽他，笑他在痴人说梦，还送他一个绰号：孙大炮。孙中山寻找同盟、战友的困难可想而知。最后，经费无着。闹革命不能不吃饭，假使不拿饷薪，糊口总是要的，孙中山尽管活动能力极强，宣传也极富煽动性，积极筹措经费，可除了少数华侨慷慨相助外，应者实在极少。

虽然檀香山兴中会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他不仅是孙中山思想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朝着革命救国的方向前进，意义非常重大。

甲午战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一次暴露无遗，这进一步促使孙中山朝着革命的方向迈进。1895年孙中山回到香港，决定与该地的另一个进步团体辅仁文社合作，成立香港兴中会，并增订章程。辅仁文社的首领杨衢云与多数成员思想远比檀香山的华侨资产阶级激进，他们在孙中山到来之前已在酝酿秘密武装反清之举。孙中山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得以迅速发展。3月16日，兴中会的重要干部孙中山、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夺取广州，将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并通过了陆皓东所提议的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旗的提案。他们准备挑选会党3000人，由香港乘船至广州担负起义的主力，定于10月26日起义。可是起义前夕，由于内部计划不周，事机泄露，70多人被捕，陆皓东牺牲，孙中山被迫逃往国外，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庭上表现极为英勇，他痛斥清朝腐败，并对从事革命排满，直认不讳。高呼：“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杀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

^① 钱西樵：《孙中山传》，古今图书店1926年版，第6页。

武装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尝试，也是革命党人后来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因此，清廷急忙悬赏查拿孙中山等人，并发布告：“现有党匪，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义谋报，扰乱省城……严拿重办，决不从轻。”尽管孙中山自此成为朝廷通缉命犯，但其革命名声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第一人。

孙中山创建兴中会，谋划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派不断地探索救国真理，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清武装斗争，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的一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3. 游离于革命与改良之间

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其革命事业。通过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通过与其他革命志士合作共同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走向，使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日渐成熟。

孙中山逃亡海外，先是逃到香港，之后和郑士良、陈少白几个人到日本。然后又转经檀香山、美国，最后到达伦敦。清廷由于孙中山发动了广州起义，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派人一路监视他的行踪。后来，就发生了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入狱的事件，俗称“伦敦蒙难记”，孙中山虽然受苦，但却进一步扩大了他是革命者的国际影响。最后经过其老师康德黎的帮助，他才得以被释放出来。在继续居留英国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依然到处进行组织和宣传，虽然收获并不大，但是他却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运动，这对于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转变，发生很大的影响。民主的概念在他的心里逐渐形成。在这期间，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与危机，他立志要建立一个比西方更优越的民主共和国。随着不断地观察、思考与斗争实践，这个共和国的轮廓就越来越清晰了。后来孙中山又由英国到达日本，结识了日本朝野人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等，他们亦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尽管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发动过几次武装起义，但其思想上仍然没有与改良主义决裂。这表现在：1900年惠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几次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合作。关于此事冯自由曾经记述道：“时梁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渠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或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梁副之。”但不久因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一